

人生，是在等待

(一)

有一位大学同学要到外地去工作，邻近的昔日同学们因此举办了一次小型聚会为他送行。

大学毕业十几年了，昔日的同学早已各奔东西，约有一半分散于美国的几个地方。席间，大家说起了各自的现状和打听到的其他同学的情况：有的在华尔街挣大钱、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大学教授、有的在公司里搞科研、有的在做博士后、还有的被裁员后仍在找工作，不一而足。想当初在学校时，成绩优劣，

可谓泾渭分明；可如今，生活的境遇似乎并不与成绩好坏成正比。人生旅途，不只是与人的智力有关，还涉及到各种其它因素，许多是力所不能及的。

中间还说起谁谁离婚了，谁谁的先生得癌症年纪轻轻就死了，撇下她一个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说到这里，同学们大

都默然了：是啊，生活中一天天碰到种种的人和事，看似都很重要，各种名利享乐也纷纷乐此不疲。可碰到疾病与死亡时，躲也躲不掉，尽管现在医疗已经很发达了，但治不好时，最后还只能是听天由命。

有一个同事，曾为公司在一项重大课题上立下汗马功劳。可他也是被诊断出癌症，只能中止工作来治疗，后来撒手而去，留下年幼的孩子……

人生，究竟是什么呢？

(二)

古人说人生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经历了这些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与此同时，人心往往是无止境的，常常向往着更多，并为此而乐而忧。

渐渐地也发现，往往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可以做出这样那样的尝试，为名利苦苦争斗，可结局未必能改进多少。

从幼时起，就有一个疑问：人生究竟是什么？长大之后，沉浸于滚滚红尘之中，时不时地发现这个问题依然萦绕在心头。喧嚣的世事人情，并没有使自己迷失心底里对生命本质的追寻与向往。

冥冥中隐约感到：人生，是在等待，等待生命中最珍贵的……

(三)

终于有一天，不经意地听人说起“真、善、忍”，心里一动，随后开始修炼，终于明白了许多许多。

渐渐地意识到，人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每个人其实都在等待，等待着心灵被开启，等待着走上生命的返本归真之路。（文/正心）◇



明慧週報

副刊

第 229 期

2009 年 8 月 28 日

回归正常思维

盛夏午后，我与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在公园相遇，她告诉我：“法轮功的传单上面把共产党说的啥也不是，是不是有‘搞政治、反国家’的人在利用法轮功？”我首先向她耐心解释“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迫害”不等于“反国家”。接着，我向她叙述了自己因信仰“真善忍”被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受迫害时的所见所闻，活生生的事实。这位听信中共宣传的女士如梦初醒，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她神情激动地说：“你应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我看着她的眼睛回答：“如果写出来，印成真相资料，会不会有人又要说‘反国家’、‘搞政治’了？”她无语，沉思。

其实，“政治”是日本人翻译英文 Politics 时，用汉字创造的一个词，中文照搬过来了。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

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一词变了味儿——生命成了“政治生命”，思想成了“政治思想”，道德成了“政治觉悟”。在中共的字典里，“政治”就是“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觉悟”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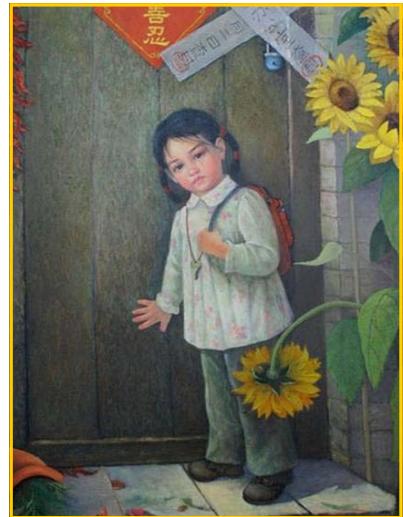
如果党撒谎时，你去揭露；党诽谤时，你去澄清；党迫害人时，你呼吁停止——这就是跟党不一致了，这些行为被中共称为“搞政治”。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正常行为，被中共说成了“搞政治”。“搞政治”成了中共整人的一顶大帽子。

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骗了哄，哄了再骗，几十年下来，人们对于中共的“整人政治”形成了一个固定思维：共产党整你了，你得忍着。如果你要揭露、制止它的恶行，你就是在“搞政治”。

一旦你被中共定为“搞政治”，人们就会发生一种“良知错位”——尽管中共残害无辜百姓，人们反而去责备受害者，好象“搞政治”比中共杀人还可怕。

看来，真正地了解真相能使人回归正常思维。这位女士听真相后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文/张倩）◇

■ 油画《无家可归》，讲述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放学后发现无家可归。



说起二战集中营，人们很自然的想到那些瘦骨嶙峋、眼神黯淡、满脸哀伤的犹太人。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剃着光头，穿着相同的条纹衣服——囚服（右图）。在那里条纹成了魔鬼的面料，它是死亡集中营里囚犯的耻辱标志和特殊身份的记号，意味着剥夺穿条纹衣服人的所有尊严和希望。

随着那段践踏生命和灭绝人性历史的过去，条纹似乎不再是善良无辜者的屈辱象征。可是今天在中共体制下的高墙内，条纹再次被用来玷污人类的尊严，历史发生的一切正在被重演。连日来，明慧网刊登了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的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因拒穿囚服，而惨遭迫害的大量事实：

大庆监狱副监狱长李维龙滥用职权，多次用断食和暴打的手段大面积迫害大法弟子，已有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近来他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为猖獗，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他任副监狱长后，不但不思悔改于以往，还命令各个监区，如果法轮功学员不穿囚服就不许吃饭，已有数名大法弟子因拒穿囚服而遭到毒打。

七月十一日，鸡西大法弟子邱学志被饿昏送去医院抢救。七月十二日，大法弟子杨功喜被恶人棍棒相加，打

“条纹”下的尊严



得遍体鳞伤，并被扔到外面示众。十三日，四名不穿囚服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殴打。十四日大法弟子张兴业遭毒打，胸腹膜被打烂，并被戴上手铐和脚镣，扔到太阳下曝晒，张兴业几乎窒息。恶警们多次烧毁大法弟子的所有衣服，或把所有衣服喷上“犯”字，大法弟子宁可披上床单，坚持不穿囚服。目前连续不断的殴打和断食使那里的大法弟子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如果人性疯狂到泯灭的程度，那就是兽性了。据说积极实施断食迫害手段的李维龙，基本是进了监区就打人，已有几百人次，每次打完人后还变态地大笑。这种疯狂病态其实就是中共体制下驯养出来的野蛮、残酷、恐怖的兽性。

面对如此罪恶，法轮功修炼者在最起码生存权利——吃饭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依然拒穿囚服，这是为什么？因为那是对强加的罪与罚的根本否定，那是对人性尊严的维护。被关押在大庆监狱的孙殿斌这样说：我们不是罪犯，怎么能承认罪犯的标志呢？！一句朴实的话语，捍卫着生命的尊严。（文/明慧哈尔滨通讯员）◇

古风悠悠：周敦颐善政

周敦颐(1017—1073)，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世称濂溪先生，以施行善政、反对草菅人命而闻名。《宋史·周敦颐传》中，有几段故事：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人。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保举，做了分宁县的主簿。该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审讯一次，立即弄清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你啊！”

有个上官推荐周敦颐，他被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这里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但是，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处死。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吏，大家都不敢和他争持，周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就回了家，打算弃官而去，说：“这样胡为，我还能做官吗？以杀人来拍上级的马屁，我不干。”后来，王逵终于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是周敦颐舍官相救的结果。

周敦颐被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高兴地说：“这是那位能弄清分宁县大疑案的人。我们南昌人，现在也有申诉冤屈的地方了！”那些富家大族、狡黠的衙



门小吏和恶少，都开始惴惴不安。经过周敦颐的“善政”教育，他们不单是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开始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了。这都是周敦颐善政教育的结果。

从上述选录的故事看，周敦颐是一个很能干且有一定政绩的官吏，他明察秋毫，善于判案；他也敢于坚持原则，秉公判案，甚至不惜开罪上司。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显示出周敦颐的特点。真正足以显示出周敦颐作为一个学者的吏治特点的，应是这样的效果：“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问题的关键，即在周敦颐“善政”的建立。这“善政”显而易见是一种文化教养，是一种道德薰习的结果。任何治理，倘若单纯地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那还是很不完善而且片面的，是一种强化的约束，依托于强制力量的治理。而在周敦颐的治理下，想做坏事的人真正担忧的，乃是“玷污了清廉的政治”并以此为耻辱。这说明，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开始以自己能否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来决定自己是否应当做某件事。有着这样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准的社会，才是治理成功的社会。对于罪犯来说，“知耻为勇”，既然已经认识到什么是“善政”，什么是“耻”，那难道还会犯罪吗？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中，犯罪的可能，已被降到最低限度。（文/郑介文）◇